

# 《共产党宣言》“两个决裂”论探讨

## ——兼论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王玉琼

**提要** 《宣言》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本文从逻辑与历史、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高度探讨了决裂论的真实内涵、辩证性质、决裂论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等问题,并结合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揭示了决裂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共产主义革命 现实的运动 自己的发展进程 国有企业 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伟大的纲领性文件,写于 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一百多年来,它经受了时间上的考验,并保持了内容上的新鲜,成了世界政治文献中翻译得最多的传播得最广的著作。列宁在谈到《宣言》时写道:“这本著篇幅不多,但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sup>①</sup>“两个决裂”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sup>②</sup>)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揭示决裂论的真实内涵、辩证性质、决裂论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等等问题,并结合分析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就是本文的写作意图。

《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sup>③</sup>(注: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以下同)当时,是否主张废除私有制是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根本分歧之所在。在 1847 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们都答应应用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一切社会病痛但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资产阶级寻求帮助。而当时工人阶级中那些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认为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分子,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种共产

本文于 1995 年 10 月 4 日收到

主义还是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即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公共制，如法国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和德国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可见，在当时，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才是工人阶级的运动。<sup>④</sup>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这不仅是共产主义革命本身的要求，而且也是为了同当时各类社会主义流派划清界限。

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批判了平均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虽然比其他学说更坚决地否定了私有制，但是它只是追求对私有财产的再分配，而不是消灭私有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指出，这种“粗陋的和无头脑的共产主义‘宣扬’向贫穷的、粗野的和没有欲望的人——这种人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违反自然的单纯性的倒退。”<sup>⑤</sup>应该说，这种学说的理论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发展的表现，在这种关系下还不能认识到大工业对于人类和个人发展的意义。

如同与社会主义流派、“粗陋的共产主义”划清界限一样，马克思、恩格斯还同空想社会主义划清了界线。应该说，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来源。但是，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只能产生不成熟的理论。这种理论不了解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把它看成是“真正理性”、“永恒正义”的体现，并且“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sup>⑥</sup>因此，“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要陷入纯粹的幻想。”<sup>⑦</sup>与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不同，“《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sup>⑧</sup>这个理论“不是以这个或那个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它“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sup>⑨</sup>

《宣言》指出：“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sup>⑩</sup>如封建的所有制代替奴隶社会的所有制，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代替封建的所有制。因而消灭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而是历来如此。但是，“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个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sup>⑪</sup>所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就是消灭一切私有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sup>⑫</sup>

《宣言》指出，“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成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sup>⑬</sup>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把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与消灭阶级联系起来，认为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首先必须夺取政权，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消灭旧的生产关系，从而消灭阶级，消灭三大差别，进而使国家逐渐消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

(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sup>①</sup>这样就把废除私有制提高到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高度,表明无产阶级的解放同全人类的解放是密切相联的。《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②</sup>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都获得了自由的发展,而个人的发展不但不妨碍别人,还可以互相鼓励、互相促进。

## 二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sup>③</sup>因此,共产主义革命不仅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要同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当资产阶级把它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sup>④</sup>时,尤其需要这样做。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意识的内容是由“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sup>⑤</sup>,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只不过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sup>⑥</sup>“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象在照像机中一样是倒映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图象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sup>⑦</sup>而资产阶级的观念本身只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象他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他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考察历史运动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比如说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忠诚信义等等概念,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那么,这样必然会造成这样一种假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而人们的一切关系则是从人的观念、想象的人、人的本质、“人”中引伸出来的。因此,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宣言》指出,这种偏私观念是资产阶级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其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他们“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sup>⑧</sup>敢于“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sup>⑨</sup>所以马克思说,当“把统治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的必要性消失了,那末,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种假象当然也就会完全自行消失。”<sup>⑩</sup>

《宣言》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但是,不管这种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种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里提倡信仰自由、宗教自由,实际上是为了它的贸易自由、竞争自由。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不仅是社会物质经济的产物，而且“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也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sup>⑨</sup>“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sup>⑩</sup>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同时也产生了新社会的思想。比如，在奴隶社会末期，封建阶级就产生了，同时产生了代表其利益的精神支柱基督教，它把古代的各种宗教打败了。当封建贵族阶级被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打败时，基督教就让位于启蒙思想。同样，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瓦解之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要瓦解。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永恒的真理。随着阶级的消灭，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也要逐渐消灭。共产主义要废除的不是什么永恒真理，而是剥削阶级的剥削思想。

### 三

《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阶级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sup>⑪</sup>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sup>⑫</sup>它的“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sup>⑬</sup>它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做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sup>⑭</sup>即“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经济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sup>⑮</sup>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

第一，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的运动。这种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从使欧洲一切反动派万分恐惧的“幽灵”到法国的巴黎公社起义、俄国的十月革命，再到中国革命，历时一百多年，业于磅礴于全世界。在我国，无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目前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从事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当前，世界上旧的政治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政治格局尚未形成，正处于大变动之中，东欧变天、德国统一、苏联瓦解，世界共产主义事业遇到严重挫折，国际敌对势力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渗透”和“颠覆”活动。“台独”活动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都是干涉中国内政和敌视社会主义的卑劣表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立足于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争取世界范围内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支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反和平演变”、“反渗透”、“反颠覆”活动。

第二，共产主义的实现有它“自己的发展进程。”<sup>⑯</sup>正如唯物辩证法所说的，它是事物自身的否定，而不是某种单纯外力作用的结果，“不是任意的否定。”<sup>⑰</sup>因此，彻底废除私有制和彻底废除私有观念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必须遵循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依据现实物质经济条件，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哥达纲领批判》里，马克思称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

义社会里生长起来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在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则称前者为不完全的共产主义，后者为完全的共产主义，二者是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社会主义阶段上，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就所有制形式而论，有一个由多种形式并存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过程。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上，则是整个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是完全的全民所有制。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以劳动者个体所有制以及少数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来我国开办的独资企业等所有制为必要补充。应该说，从 80 年代中期的承包制，到近年来提出的转移企业经营机制，国有企业的改革在放权让利的范围内做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却始终没有走出困境。从盈亏状况看，仍有 2/3 大中型国有企业亏损，余下的主要也是微利。为此，有人以为，国有制的性质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主张利用外资“嫁接”改造国有企业，并逐渐缩小国有企业的比重。有人则认为，国有企业的比重必须达到 51% 以上，才能保证它的主导地位。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欠偏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不过，正如党的十四大报告所指出的，必须让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它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来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并加强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国有企业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对企业财产的所有权。”“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国有资产实行分级行政管理。”即分中央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管理。为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增进经济效益，更好地发挥其主导作用，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借鉴外资企业的成功经验，加快、加大改革力度。只看国有经济比重，而不问其是否实际在整个国民经济生活中起到了主引导、规范和影响作用，这是一种“只重形式，不问内容”的教条主义做法。当然，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有经济必须控制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如能源、交通、通讯、邮电、金融等，这些领域禁止外资进入，不能轻率利用外资“嫁接”改造，以免外商操纵我国的经济命脉，危及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sup>⑨</sup>

同样，就意识观念而言，由于其相对独立性质，情况则更加复杂。私有制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已存在几千年，特别在我国，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有一百余年之久，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和其他腐朽思想在社会上还存在。因此，共产主义思想与这些腐朽思想的斗争是长期的和艰巨的。而就无产阶级本身来说，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受客观发展过程的制约，因而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认识是一个发展过程，不可能一下子达到正确认识。因此，对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必须有正确的态度、方针和方法。当前主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我们开创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的新局面。当然，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我们的思想、工作和行为，绝不是要立即实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的政策。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同贯彻社会主义的现行政策，这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

正如《宣言》指出的：“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sup>①</sup>所以，我们既要坚决地贯彻社会主义阶段的现行政策，又要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和远大目标，把二者统一起来。

第三，共产主义的实现在于“取得社会生产力”<sup>②</sup>，“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sup>③</sup>。也就是说，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彻底地决裂，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sup>④</sup>“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sup>⑤</sup>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当社会生产力达到了极高水平，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化，才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实现这个根本目标的物质手段。我们反对脱离实际空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做法，也反对孤立地强调生产力标准而不顾人民利益的做法。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对生产力标准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

在《哥达纲领批判》里，马克思精辟地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图景，他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sup>⑥</sup>因此，必须为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创造积极的现实的条件。我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一切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都必须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洪流中。21世纪辉煌属于社会主义的中国、属于每一个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你、我、他。

#### 注释：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91页。

②③④⑥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 ②③④⑥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272、285、236—237、283、231、264、265、265、273、232、273、270、268、268、262、272、43页。

⑤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4页。

⑦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9、12页。

⑫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4页。

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

（作者工作单位：厦门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 责任编辑：吴蓁蓁）